

《西夏译经图》解

史金波

北京图书馆珍藏有近百部西夏文佛经，为世人所瞩目。周叔迦先生曾为之编目，发表于1932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上。目录中第22号《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简介有云：“经背表糊杂用西夏文《大智度论》、《菩萨地持经》等文，又有他经佛象一页，画译经之图。”^①文中所述译经之图究属何时之文物，描绘何人译经之故事，有何学术价值，皆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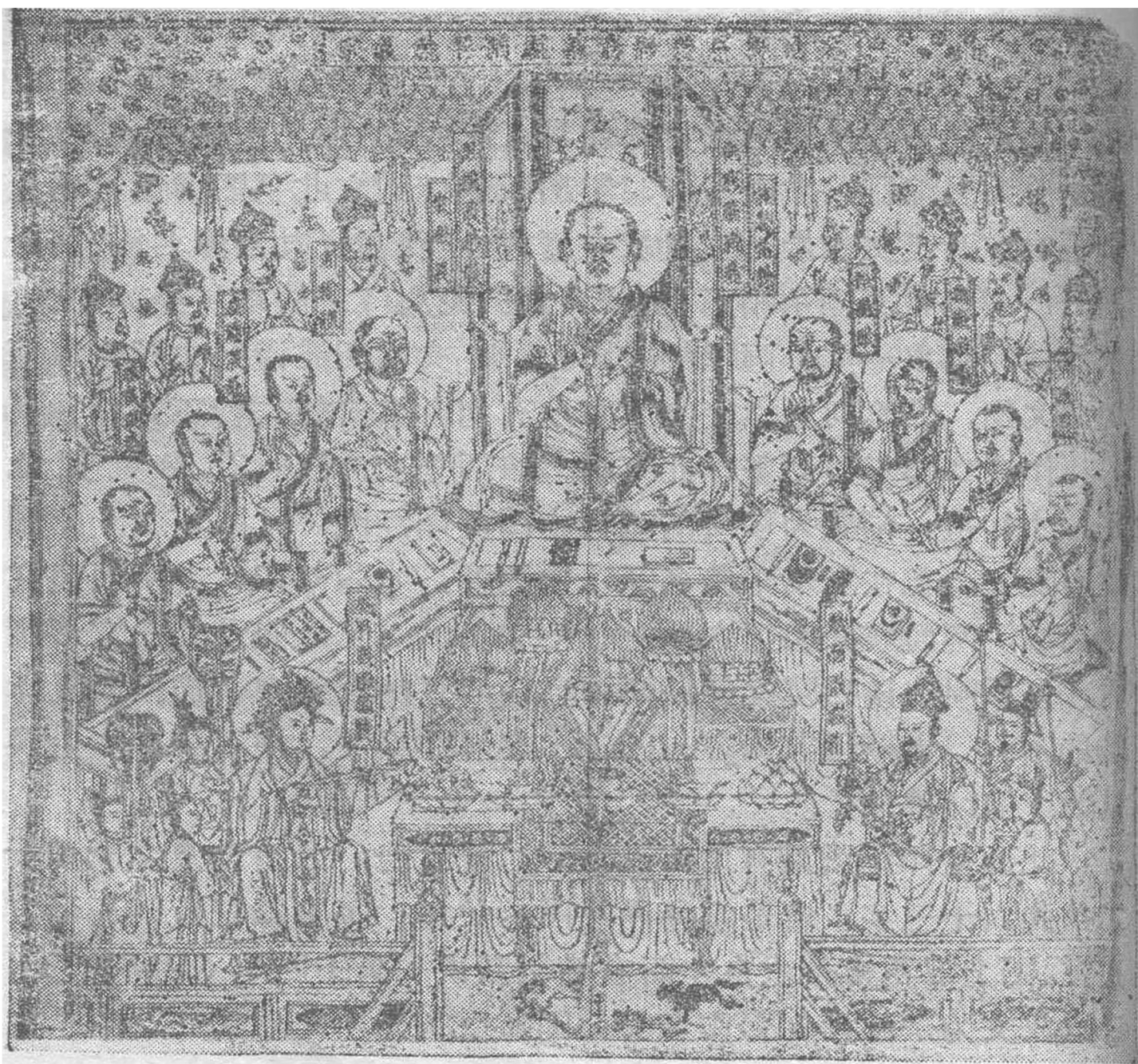
作者1973年重新整理北京图书馆西夏文佛经时有幸见到此图，才知是一幅极为珍贵的元刊本西夏译经图（见图版）。此图在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之卷首，木版刻印，占两面经文的篇幅，两面展开为正方形，边长约27cm。从纸张及其长宽形制看，显系附在该西夏文经前面为宣扬西夏佛教盛事、描绘西夏译场的图画。大概因其内容与《千佛名经》无关，被周叔迦先生误认为“他经佛象”。

此西夏译经图刻有僧俗人物计二十五身，且有西夏文款识十二条共六十三字，这是解释译经图的关键。每条款识皆有长形方边框。图上部花帷幕上自左而右横刻款识一条十四字（附录1），译成汉文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②。其下有一高

注 释

①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3号（以下简称《西夏文专号》）279—282页，1932年出版。

②白智光三字，白为姓，用音译，智光为僧人法号，用意译。以下人姓名译法同，即姓氏用音译，名字用意译。



西夏译经图

僧像，于此图人物中最大，这就是主持译经的安全国师白智光。他内著短袖花衣，外披袈裟，趺跏端坐于正中。其前置一书案，上有梵帙经书一册，墨砚一台，毛笔两支。他似乎在开口讲解，右手以手势相辅助，显示出译场中主译人的身份和形象。靠近白智光像的两侧各有西夏文五字，右边译为“译者祐助相”，左边译为“僧俗十六人”（附录2）。这十字实为一条款识，为构图对称美观起见，分刻于左右两处，连起来意译为“辅助译经者僧俗十六人”。在此题款两侧各有图像两排，每排四人，前僧后俗，共十六人，正与西夏文款识所记相同。前排每四位僧人面前有长案一条，上置经书、经卷及笔墨纸砚，八位僧人身著短袖素衣，披袈裟，比肩斜坐。图像比较生动地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年龄、相貌和神态。其中六人右手持笔，左手有的持经卷或经册，有的将经卷或经册置于案上，左第三人面前展开的经卷上还能看出“屈曲类符篆”的文字。^①另两人两手做不同的手势，毛笔和经册置于案上。后排八人从衣冠上看，系世俗人，他们或合十敬礼，或仰视听讲，或闭目思索。这僧俗十六人都在主译人白智光的周围从事严肃的译经工作。我们知道，从梵文佛经译为汉文的译场组织分工是十分复杂细密的，除主译人外，尚有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总勘等辅助人员，分管记录、翻译、核定译文、润色词句等工作，有的译场要数十人，甚至数百人。^②西夏译经图中辅助译经的十六人，应属于上述各类辅助人员之列。八个僧人上方各有西夏文款识记其姓名。右面四人自上而下第一身名为“北却慧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记西夏文的创制：“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

②见（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348—367页），参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第九；《翻译文学与佛典》，第十；《佛典之翻译》，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241—266页。

月”，北却为党项族姓；第二身名为“赵法光”；第三身名为“嵬名广愿”，嵬名为西夏皇帝姓，也是党项族姓之一，此僧人是皇族；第四身名为“昊法明”。左面四人自上而下第一身名为“曹广智”；第二身名为“田善尊”；第三身名为“西玉智园”，西玉亦为党项族姓；第四身为“鲁布智云”，鲁布为党项族姓（附录3）。这八人中有四人是典型的党项族姓，另四人可能是汉族。后排的八个世俗人未列姓名。

译经图的下部正中前后有两部桌案，后者离译者较近，桌上置经书、经页等物。前者置供品，桌两侧各有人物图象四身。左面一女身坐象较大，头饰别致，手持香炉，旁有西夏文款识六字，译为“母梁氏皇太后”（附录4）。其后立黄门侍从三人，手持团扇等物。右面一男身坐象较大，手持鲜花，穿著华贵，旁有西夏文款识五字，直译为“子明盛皇帝”（附录5），应意译为“子盛明皇帝”，余三人较小，亦为黄门侍者一类，手持金瓜等物。

二

要了解译经图的价值，必先断定它所反映的具体历史时期。然而译经图上并未标出具体年代，图中僧人姓名也未见史籍记载。我们只能从图中太后、皇帝的名号上去寻找线索。

西夏有两个梁氏皇太后。公元1067年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谅祚死后子秉常袭位，时年仅七岁，母梁氏垂帘听政，为第一梁氏皇太后。秉常娶梁太后侄女为皇后，16岁始亲政。梁太后与秉常不和，公元1031年梁太后幽秉常于兴州城外，自己复视国事，时秉常21岁，过四年梁太后卒。次年秉常卒，年仅26岁，是为惠宗。秉常子乾顺嗣位，时方三岁，为西夏第四代皇帝。母梁氏亦垂帘听政，是为第二梁氏皇太后。1099年梁氏被辽国鸩死，乾顺始

视国事，时年16岁。①译经图中的梁氏皇太后当为史书记载之两个梁氏皇太后之一，图中的盛明皇帝为梁氏之子。当不出秉常和乾顺二人。但史籍中并未记录秉常和乾顺的尊号，仅有庙号、谥号。秉常死后谥为“圣文皇帝”，庙号惠宗；乾顺死后谥为“康靖皇帝”，庙号崇宗，与“盛明”皆未合。

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悲华经》和《经律异相》卷首的经题中记有译者梁氏皇太后及其儿子的尊号和校者的尊号②（附录5），译成汉文是：

天生全能、祿番祐圣、式法皇太后梁氏 御③译
就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 御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嵬名 御校

又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西夏文《佛说宝雨经》有另一梁氏皇太后及其儿子的尊号和校者的尊号④（附录7），译成汉文是：

胜智广祿、治民集礼、德盛皇太后梁氏 御译
神功胜祿、习德治庶、仁净皇帝嵬名 御译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嵬名 御校

西夏皇帝是党项族，姓嵬名氏。公元1141年西夏群臣曾给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上尊号为“制义去邪”⑤。《悲华经》、《经

①见《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四八六。《西夏书事》卷二十二——三十一。

②见《西夏文专号》288页、322—323页。《经律异相》太后尊号少祐圣、多正国二字。

③此字有神、贤、御等意，罗福成在此处译为“贤”，（日）西田龙雄译为“神”。因其前面为太后、皇帝名号，用御字似更妥当。以下同此。

④见《西夏文专号》203页。

⑤见《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

律异相》和《佛说宝雨经》的校者尊号恰有“制义去邪”四字，可知校者为仁孝无疑。译者“大明皇帝”和“仁净皇帝”之前皆有梁氏皇太后题名，可知两个皇帝应是一为秉常、一为乾顺。两皇帝尊号中唯“大明”二字与译经图中“盛明”二字意义相通^①，而“仁净”与“盛明”相去甚远。可以基本上确定《悲华经》和《经律异相》的译者“大明皇帝”即译经图中的“盛明皇帝”。如果我们能断定“大明皇帝”是秉常和乾顺中哪一个的尊号，译经图中的“盛明皇帝”究属何人也就迎刃而解了。这还需要借助于西夏文、汉文合璧的《凉州感应塔碑文》。

著名的《凉州感应塔碑文》记有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的尊号。此碑建于西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五年，即公元1094年。西夏文碑铭中8—9行追述西夏大安二年、八年事时，提到已故的才净皇太后和面沟城皇帝^②（附录8）。大安为惠宗秉常年号，才净皇太后应是第一梁氏皇太后，面沟城皇帝应是秉常。汉文碑铭相应部分记为“先后之朝”。又西夏文碑铭10—11行有“此后，德盛皇太后、仁净皇帝等已受国土”之语^③（附录9），即指与此相应的汉文碑铭中的“二圣临御”，从所述之史实和所用天安礼定二年^④、天祐民安四年、五年的纪年看，应为当时皇帝崇宗乾顺时期，德盛皇太后是第二梁氏皇太后，仁净皇帝是崇宗乾顺。

①“大明”二字在经题中对译为“明大”，恰如“盛明”二字在译经图中对译为“明盛”一样。又西夏文字典《文海》66页2面4行、44页1面1行、79页1面4行、79页1面6行都解释“盛，为大之谓”或“盛也，为大也”。

②《西夏文专号》164页。

③《西夏文专号》165页。

④天安礼定是惠宗秉常最后一个年号，用不到一年秉常便死去，其子乾顺即位后，改元天仪治平。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责乾顺未愈年而改元。然此碑文中竟出现“二安礼定二年”，且是乾顺当时所记。或许乾顺即位后并未立即改元，仍用其父年号至二年？

碑文中第二梁氏和乾顺的尊号正与《佛说宝雨经》译者德盛皇太后、仁净皇帝尊号相符。证明《佛说宝雨经》译者的题名为崇宗乾顺，而《悲华经》和《经律异相》译经的皇太后和带有“大明”尊号的皇帝题名自应是第一梁氏皇太后和秉常了^①。进而可以推知译经图中的“明盛皇帝”应是秉常。

《凉州感应塔碑文》中秉常尊号为“面沟城皇帝”，为何在译经图中又有“明盛皇帝”之称？原来西夏皇帝的名号比较复杂，除有一般尊号、死后的庙号、谥号和陵号外，还有西夏皇帝特有的带“城”字的尊号。如仁宗仁孝有“珠城皇帝”^②和“护城皇帝”^③（附录10）之称，其它又有“明城皇帝”^④（附录11）之称谓。这

①罗福成在《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载《西夏文专号》341—360页）中记云：“按崇圣母梁为氏，惠圣母亦为梁氏。感通塔记中有盛德皇太后、仁净皇帝当为惠宗与国母梁氏。此处恐是崇宗之母梁太后。不知篇否，姑记于次。”实际上《感应塔碑文》明确记载德盛皇太后、仁净皇帝修塔立碑在天祐民安四年、五年，天祐民安是西夏崇宗乾顺年号，碑文所叙仁净皇帝，并非先帝，“仁净”亦非谥号，而为尊号。仁净皇帝当然是乾顺无疑，罗氏误认为惠宗秉常，至使父子两朝译经事颠倒错乱。王静如在《西夏文经典题款译释举例》（载《西夏研究》第一辑，1932年出版）中论及此事时，把罗氏这一错误的推测更加肯定了：“仁净皇帝即西夏惠宗，惠宗谥康靖，此当为佛号也。凉州感应塔碑为惠宗子崇宗天祐民安五年所立，碑文中数称盛德皇太后及仁净皇帝，则此提款当是惠宗及其母梁氏毫无疑意。”日西田龙雄沿用此说，在1966年出版的《西夏语之研究》第二卷（295—296页）和1975年出版的《西夏文华严经》第一卷（6—7页）、1976年出版的第二卷（《西夏译经杂记》3—12页）中都把带有“盛德皇太后”和“仁净皇帝”题名的《佛说宝雨经》误定为第一梁氏及其子秉常译，把《悲华经》、《经律异相》等误定为第二梁氏及其子乾顺译，并据此为西夏译经史分期。

②见《西夏文专号》261页。

③吴峰云、李范文、李志清《介绍西夏陵区的几件文物》载《文物》1978年8期83页。

④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一〇八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8期，图九。

种带“城”字的尊号可能是死后才用的，与谥号的作用相仿佛。

“面沟城皇帝”可能就是“明盛皇帝”惠宗秉常死后的又一种尊号。

确定“明盛皇帝”为秉常尊号，还有另外一个根据相佐证。译经图中皇帝及其母梁氏皇太后同时出现在译场中。皇帝已有胡须，不应是乾顺。因为第二梁氏死时，其子乾顺年仅十六岁，第二梁氏在世时，乾顺小于或等于十六岁，这与图中长胡须的皇帝年龄相去较远。第一梁氏死时，其子秉常25岁，已经成年。把图中的皇帝定为秉常。从年龄上也比较相近。因此，该译经图所反映的西夏译场也可相应断定为秉常后期。

三

西夏译经图对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佛典的翻译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启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译经图中皇太后、皇帝亲临译场，以形象的手法展现出西夏王朝对佛教的崇信和对佛经翻译事业的重视。主译人白智光在图中形象高大、地位突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对高僧的宠信以及给予他们极高的地位。西夏历代统治者经常对邻近各王朝、政权用兵，各族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图中梁氏就曾亲自将兵与宋朝打仗。交战双方均造成重大损失。^①西夏历代统治阶级又都崇信佛教。元昊在兴庆府建高台寺，谅祚在兴庆府建承天寺，秉常和乾顺都重修过凉州感应塔，乾顺还修建了有名的甘州大佛寺。正如《凉州感应塔碑文》汉文碑铭所记：“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磻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②元昊父德明、元昊、谅祚、

^①见《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

^②见《西夏文专号》153页。

秉常都曾向宋朝赎取大藏经。他们修建寺庙，塑造佛身，不惜劳民数万，铺张钱财。译经图中的梁氏一方面为争夺领土和财物而亲临战场，另一方面却热衷宣扬普度众生的佛教，赎取藏经，亲临译场，完全暴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伪善面貌。西夏统治阶级大力推行佛教不外两个目的，一是想为自己廉价地购买“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①，二是企图用宗教欺骗、麻醉各族劳动人民，以利于维护其封建统治。

译经图是研究西夏译经史的关键性资料。西夏文创制后，西夏统治阶级就着手把大藏经译为西夏文。元昊在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公元1047年）“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释经文，易为蕃字。”^②在此以前，宋朝曾先后赐给德明（公元1030年）和元昊（公元1034年）汉文大藏经各一部。^③这里所指“中国所赐大藏经”可能就是宋朝赠给的两部佛经之一。蕃字即指西夏文。这里指明演释经文并翻译成西夏文的是回鹘僧人。毅宗谅祚和母后没藏氏曾于公元1055年役兵民数万，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大藏经，延回鹘僧讲经并时临听讲。^④可见西夏建国以后，回鹘僧人在传播佛教、讲解经文、翻译佛典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可算西夏译经事业的第一期。但目前尚未见到这一时期的西夏文佛经译本。回鹘僧人把汉文经典译为西夏文要同时精通难懂的汉语文和西夏语文。要把数量极大的大藏经译成西夏文仅用这种方法会受到相当的限制。此后如何译经，文献并无记录，只有毅宗谅祚和惠宗秉常时期继续向宋朝求赐大藏经的记载。译经图正

①《列宁全集》第十卷62页。

②见《西夏书事》卷十八。

③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一一五。

④见《西夏书事》卷十九。

好再现了秉常时期译场的组织与规模，反映了西夏中期的译经情况，填补了西夏译经史上的空白。目前发现的大量西夏文佛经中不少记有译经人的题名。如北京图书馆所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悲华经》、《经律异相》、《慈悲道场忏法》等皆有第一梁氏皇太后及其子秉常译经的题名，^①苏联所藏《佛说宝雨经》记有第二梁氏皇太后及其子乾顺译经的题名。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时期，是西夏译经的重要时期，西夏文大藏经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因此西夏译经图专门描绘这一时期的译经场面并非偶然。这可算西夏译经事业的第二期。仁宗仁孝在西夏文佛经中多做为校者出现，可能至此时期西夏文大藏经已基本译完。文献中也未记载崇宗乾顺以后再向宋朝赎取大藏经。西夏文《佛说宝雨经》卷第十卷首押捺之西夏文记印中有“皇太后罗氏全增新写番大藏经一藏……”字样^②，罗氏为仁孝之母，番大藏经即指西夏文大藏经。可知仁孝时西夏文大藏经已经译完。黑城出土的汉文《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后有仁宗仁孝所作汉文发愿文，内记“…谨于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③这段文字记录了仁孝时期大量散发番（西夏文）、

①见《西夏文专号》275、288、322—323、324页。又（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二卷后记《西夏译经杂记》3—12页中介绍了斯得哥尔摩民族博物馆藏有数种西夏文经，其中四种是惠宗秉常时期译，两种是崇宗乾顺时期译，西田氏也把两朝的时期颠倒了。

②见《西夏文专号》206页。又见（苏）聂历山和（日）石滨纯太郎《西夏语译大藏经考》载《西夏文专号》73—79页。

③见《西夏文专号》22—23页。

汉佛经。并未提及译经之事，还表明西夏文佛经译成后已刻板印制和汉文佛经同时流行了。^①仁孝时期以校经为主，校过的西夏文佛经已知有题名的就有《金光明最胜王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经律异相》、《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大宝积经》、《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等。^②这一时期西夏文化事业最为发达，可做为西夏译经事业的第三期。仁孝死后，西夏历三十四年亡于蒙古。这段时间由于西夏朝代更迭频繁，政权不稳，战乱频仍，文化事业包括佛经的校译方面也必定受到很大影响。

西夏时期共译了多少卷西夏文经，就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材料尚无定论，但据日本善福寺所藏元代平江路磻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中的记载，元大德六年（1302年）曾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③。元代并未译西夏文经，因此这些经应是西夏时期已经译出的。那么，西夏译经卷数当不少于三千六百二十卷。按汉文大藏经的译成经历了从东汉至唐宋近千年的时间，仅主译者先后就有一百八十余人，共译经一千三百余部，五千余卷，^④这在世界翻译史上

①从该发原文还可看出当时在诵读西夏文、汉文佛经的同时，还诵读藏文（西番）佛经，表明这一时期藏族文化在西夏的影响。另外西夏文佛经除主要译自汉藏外，还有一部分译自藏文佛经（见（苏）聂历山和（日）石滨纯太郎《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璧考释》载《西夏文专号》247—258页）。关于藏族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将另文讨论。

②见《西夏文专号》261、279—280、285、288、290、319、322—323页，195页，参见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一卷，4—14页。

③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载《观堂集林》卷21，又见（日）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二卷295—301页。

④（元）庆吉祥等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第一，参见叶恭超《历代藏经考略》载《现代佛学》一卷，一、二期。

也是惊人之举。西夏从建国初期开始译经，仅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就翻译出卷帙浩繁的西夏文大藏经，也十分令人惊叹。不难想见，当时的政府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要设置相当规模和组织严密的译场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事业。译经图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况。图中除主译人外，仅有资格绘象的高级助手就有十六人之多，其余直接、间接参与这件工作的人员正不知有多少。还可以想见，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象白智光这样主持译经的人也一定还有多人。西夏文大藏经的完成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上也占据着相当的地位。比较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最早译完一藏并付之梓版刻印流行的应首推西夏文大藏经。用藏文翻译佛经虽较早，但藏文大藏经的完成是十三世纪的事。蒙、满文大藏经的出现更是比较晚近的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译成虽是直接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佛教服务的，但它对西夏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保存到现在的西夏文佛典成了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近几十年来，中外西夏研究学者凡提及西夏佛经译者时，都依据西夏文佛经卷首的提名确认译者为两个皇太后和秉常、乾顺两个皇帝。作者认为皇太后、皇帝译这样多经不大可能，但真正译者是谁？以前因苦于没有材料，难以判定。译经图明确地记录了主译人白智光和辅助译者人名，解决了这一悬案。西夏的梁氏皇太后和皇帝大力提倡译经事业，政府组织专门译场，他们有时还亲临译场，但那不过是走走过场、作些布施功德而已，正象译经图中描绘的那样，他们并未真正参加译经工作。然而他们却在佛经卷首译者的位置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真正参加译经工作的人，象主译人白智光及其助手们，他们严肃而辛勤地工作，为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而他们的名字却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徒具虚名的皇太后、皇帝窃取了。

译经图的发现把这一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这对研究西夏译经史是十分重要的。

译经图中所列主译人和辅助译经者共九个人，白智光可能是龟兹人或是汉族，还有四个是党项族，其余四人也可能是汉族。他们当中有的精通西夏语（即党项族语言）文，有的精通汉语文，有的可能兼通两三种语文，这样党项族、汉族和其它民族僧人、学者，分工合作，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艰巨的译经事业。同时还反映出当时在西夏境内党项族、汉族以及其它民族在文化方面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一个侧面。这种有党项人和汉人共同参加的译经方式比起早期专请回鹘僧人译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下面简单回顾一下汉文译经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汉文大藏经的译成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从东汉至西晋为西域人主译时期，当时并无原本，但凭译者的背诵，亦无规模宏大之译场；第二期从西晋至隋代为内地汉人和西域人共译时期，此时已有原本；第三期是唐代，此时为译经全盛时期，译者多为去印度取经之汉族高僧，他们通梵、汉两种语文，又深通佛理，译经数量和质量皆达空前高度；宋、元时期所译经典不多，已至扫尾时期。^①西夏译经开始于汉藏佛典译成之后，故能较快地借鉴其成熟的经验。从译经图中可以看到译场内有关经书、经卷两种，可能其中之一为汉文原本，另一种为西夏文译本。从图中译经人员的配置、分工和译场的规模看略似于汉藏译经的第二期或第三期，也即达到了相当成熟发达的时期。

译经图绘有西夏时代僧、俗、男、女等人物的形象。尽管是元代手笔，仍可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供养人对照比较，是研究西夏各民族人物、服饰的有用资料。特别是西夏帝王和皇太后的形象，还是首次出现，尤其值得重视。

^①同218页^②。

西夏译经图作为一幅反映宗教生活的图画，不免拘泥于比较严格的对称，但在我国古代木刻艺术上仍算得上精品。它集各种类型的人物二十五身于一图，层次清楚，繁而不乱。主要人物各有特色，互不雷同。从整体看，构图完整，有比较强的立体感。刻工细致、刀法纯熟，一丝不苟，就连卷起的花帷帐也给人一种飘然欲动的真实感觉。加之宋、元时期的木刻画保存下来的不多，这幅译经图就更可宝贵了。

总之，这幅西夏译经图为西夏译经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领域。目前在确定西夏文大藏经真正译者和划分译经时期方面都堪称为关键性资料，在西夏文化艺术的研究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物。

影宋本《集韵》在天一阁发现

《集韵》是宋代丁度、李淑等奉诏修定的一部韵书。共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比《广韵》增加一倍有余。内容注重文字形体和训诂，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音的重要资料。宋刻本据记载有三种：即段玉裁校勘《集韵》时所据的宋本以及北宋本和吴藏本。今春中华书局有关同志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发现了《集韵》影宋钞本，即所谓吴本。卷首有汲古阁图记，书末有段玉裁跋，其中谈到亲为校勘一事等。可见所谓段据宋本也即吴藏本。现在天一阁与中华书局决定整理出版。（树）